

## ※ 研究動態 ※

# 廬山慧遠研究綜述

李勤合\*

廬山慧遠是中國哲學史、佛教史和文學史上的重要人物，海內外學界都十分重視他。雖然有關專著可謂汗牛充棟，但大家的研究興趣仍然有增無減，新著迭出。這裏謹將近代以來有關廬山慧遠的研究概況略做評述，供學界參考。不足之處，尚祈方家斧正！

## 一、慧遠研究論著概況

慧遠研究的成果繁多，僅專著就有田博元《廬山慧遠學述》（1974年）、方立天《慧遠及其佛學》（1984年）、區結成《慧遠》（1987年）、劉貴傑《廬山慧遠思想析論》（1996年）、曹虹《慧遠評傳》（2002年）、龔斌《慧遠法師傳》（2007年）、李幸玲《廬山慧遠研究》（2007年）、張敬川《廬山慧遠與毗曇學》（2012年）、史經鵬《從法身至佛性：廬山慧遠與道生思想研究》（2016年）、解興華《廬山慧遠與中國哲學心性本體論的建立》（2016年）、李勤合《廬山慧遠教團研究》（2016年）等等<sup>1</sup>。

---

\* 李勤合，江西省九江學院廬山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sup>1</sup> 田博元：《廬山慧遠學述》（臺北：文津出版社，1974年）。方立天：《慧遠及其佛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年）。區結成：《慧遠》（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年）。劉貴傑：《廬山慧遠思想析論》（臺北：圓明出版社，1996年）。曹虹：《慧遠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後有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版）。龔斌：《慧遠法師傳》（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李幸玲：《廬山慧遠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7年）。張敬川：《廬山慧遠與毗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史經鵬：《從法身至佛性：廬山慧遠與道生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解興華：《廬山慧遠與中國哲學心性本體論的建立》（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李勤合：《廬山慧遠教團研究》（北京：社會科

此外，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1938年）、許理和(E. Zürcher)《佛教征服中國》(*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1959年）、鎌田茂雄《中國佛教史》第二卷（1983年）、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二卷（1985年）、郭朋《中國佛教思想史》（1994年）、白壽彝總主編《中國通史》第五卷（1995年）、賴永海主編《中國佛教通史》（2010年）等對慧遠皆有濃墨重彩之描述<sup>2</sup>。

大陸和臺港各高校學位論文，以慧遠為主題的也不少，尤其是在進入一九九〇年代後，有明顯增多的趨勢，如：臺港地區盧笑芳《慧遠佛教思想研究》（1983年）、陳廣芬《慧遠思想中般若學與毗曇學之關涉》（1993年）、陶文本《慧遠與僧肇般若學的比較研究》（1995年）、林素瑜《慧遠形神思想之研究》（1997年）、盧桂珍《慧遠、僧肇聖人學研究》（1999年）、李幸玲《廬山慧遠研究》（2001年）、蒲有任《魏晉至隋唐政教之爭——以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為中心》（2011年）、陳淑玲《慧遠大師因果報應觀之探討》（2013年）、鄭琨績《廬山慧遠形神思想之研究》（2015年）、朱惠明《佛教的輪迴主體觀——以慧遠的「形盡神不滅」論為探討中心》（2016年）等<sup>3</sup>。大陸以慧遠為主題的學位論文則在新世紀明顯

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

<sup>2</sup> 湯用彤：〈釋慧遠〉，《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重慶：商務印書館，1938年）。E. Zürcher,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Leiden: E. J. Brill, 1959)。鎌田茂雄：《中國佛教史》第二卷（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年）。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二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郭朋：《中國佛教思想史：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思想》（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白壽彝總主編：《中國通史》第五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賴永海主編：《中國佛教通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

<sup>3</sup> 盧笑芳：《慧遠佛教思想研究》（香港：能仁書院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年）。陳廣芬：《慧遠思想中般若學與毗曇學之關涉》（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陶文本：《慧遠與僧肇般若學的比較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林素瑜：《慧遠形神思想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盧桂珍：《慧遠、僧肇聖人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年）。李幸玲：《廬山慧遠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年）。蒲有任：《魏晉至隋唐政教之爭——以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為中心》（新北：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陳淑玲：《慧遠大師因果報應觀之探討》（新北：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年）。鄭琨績：《廬山慧遠形神思想之研究》（新北：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年）。朱惠明《佛教的輪迴主體觀——以慧遠的「形盡神不滅」論為探討中心》（新北：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年）。

增多，如：許宇飛《論慧遠》（2005年）、夏曉楠《慧遠人生哲學思想研究》（2006年）、李智敏《慧遠與東晉末期廬山地域的詩文創作》（2007年）、解興華《〈大乘大義章〉試析》（2007年）、蔡霞《慧遠集校注》（2007年）、陳建華《廬山慧遠「實有」思想研究》（2008年）、張增勇《慧遠業報輪回說淺論》（2008年）、張敬川《論廬山慧遠的念佛思想》（2008年）、吳丹《〈大乘大義章〉研究》（2008年）、曾金秋《慧遠三世報應倫理思想研究》（2009年）、游雲會《廬山慧遠佛學思想研究》（2010年）、陳旭《慧遠生平著作考》（2010年）、羅驥《慧遠與東晉佛教的變遷》（2010年）、張魏魏《慧遠的淨土信仰研究》（2011年）、于林洋《慧遠佛學思想源流探討》（2011年）、張凱《廬山慧遠法身思想探析》（2011年）、解興華《慧遠與晉宋佛學的思想轉向》（2011年）、張敬川《廬山慧遠與毗曇學》（2011年）、李勤合《廬山慧遠教團研究》（2011年）、史經鵬《從法身至佛性：廬山慧遠與道生思想研究》（2012年）、譚雪葉《廬山慧遠的形神思想研究》（2013年）等<sup>4</sup>。此外，國外亦有以慧遠為專題的學位論文，如 Hong Yue Guo, *Rebirth and Karmic Retribution in Fifth-century China: A Study of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ist Monk Lu Shan Huiyuan* (2007)<sup>5</sup>。

<sup>4</sup> 許宇飛：《論慧遠》（長沙：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夏曉楠：《慧遠人生哲學思想研究》（南昌：南昌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李智敏：《慧遠與東晉末期廬山地域的詩文創作》（杭州：浙江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解興華：《〈大乘大義章〉試析》（重慶：西南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蔡霞：《慧遠集校注》（北京：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陳建華：《廬山慧遠「實有」思想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碩士論文，2008年）。張增勇：《慧遠業報輪回說淺論》（武漢：華中科技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張敬川：《論廬山慧遠的念佛思想》（廣州：中山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吳丹：《〈大乘大義章〉研究》（蘇州：蘇州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曾金秋：《慧遠三世報應倫理思想研究》（長沙：中南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游雲會：《廬山慧遠佛學思想研究》（南昌：南昌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陳旭：《慧遠生平著作考》（瀋陽：遼寧大學學位論文，2010年）。羅驥：《慧遠與東晉佛教的變遷》（天津：南開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張魏魏：《慧遠的淨土信仰研究》（開封：河南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于林洋：《慧遠佛學思想源流探討》（重慶：西南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張凱：《廬山慧遠法身思想探析》（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學位論文，2011年）。解興華：《慧遠與晉宋佛學的思想轉向》（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張敬川：《廬山慧遠與毗曇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李勤合：《廬山慧遠教團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史經鵬：《從法身至佛性：廬山慧遠與道生思想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譚雪葉：《廬山慧遠的形神思想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

<sup>5</sup> Hong Yue Guo, *Rebirth and Karmic Retribution in Fifth-century China: A Study of the Teachings of the*

至於以慧遠為研究對象的單篇論文則數不勝數。較重要的有三本論文集，一是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慧遠研究・研究篇》（1962年），集中展現了日本學界對慧遠研究的成果；另兩本是「紀念慧遠大師誕辰一六七〇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4年）和「紀念慧遠大師圓寂160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6年）<sup>6</sup>。

## 二、慧遠研究內容分析

### （一）慧遠作品之輯佚

《高僧傳》記載慧遠有文集十卷，此後歷代史志記載有所不同，如《隋書·經籍志》著錄《慧遠集》十二卷，《舊唐書·經籍志》載為十五卷，《宋史·藝文志》著錄慧遠《廬山集》十卷，其他《崇文總目》、《通志》等亦有收錄；宋後逐漸散佚，不復有傳，但散落在其他專著、總集、類書中尚有不少。

明代始有慧遠文集的輯佚。崇禎末年梅鼎祚編《釋文紀》，其中卷八收錄慧遠〈阿毗曇心敘〉等十八篇，是慧遠文章的第一次輯佚。

清代嚴可均輯《全晉文》時，從《弘明集》、《出三藏記集》、《太平御覽》等書中共輯出慧遠作品十五篇，收錄於卷一六一及一六二。

民國九年，江蘇海門居士周紫垣多方蒐羅，得慧遠遺文二十六篇，編成一冊，在武昌佛學院以《廬山慧遠法師文集》名義出版<sup>7</sup>。這是目前可見慧遠文集的第一個單行本。

周紫垣曾以此文集贈送江蘇如皋沙元炳居士，沙氏得文集後，以其搜輯未備，乃從家藏《全晉文》、《廬山志》諸書加以增補，成三十四篇，未及刊印而逝世。沙元炳弟子項智源繼承遺志，又從吳宗慈重修《廬山志》增五言四篇，再經當時淨土大師印光作序，於民國二十四年以《廬山慧遠法師文鈔》名義由蘇州弘化社出版<sup>8</sup>。

*Buddhist Monk Lu Shan Huiyuan* (Ph.D. diss., Indiana University, 2007).

<sup>6</sup> 木村英一編：《慧遠研究・研究篇》（東京：創文社，1962年）。釋大安主編：《超越千載的追思》（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溫金玉主編：《中國淨土宗研究：慧遠篇》（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8年）。

<sup>7</sup> 周紫垣輯：《廬山慧遠法師文集》（武昌：武昌佛學院，1920年）。

<sup>8</sup> 沙元炳、項智源輯：《廬山慧遠法師文鈔》（蘇州：蘇州弘化社，1935年）。

差不多與項智源同時，由僧懺法師選輯之《慧遠大師集》由佛學書局民國二十三年出版，輯〈沙門不敬王者論〉等論文、書信、遊記等，共二十三篇，書前冠有慧遠大師傳略<sup>9</sup>。

以上三種民國時期的慧遠文集，以《廬山慧遠法師文鈔》所收較為齊全，且經印光法師撰序，最為流行，各地寺院流通甚多。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二十世紀五〇年代時，曾組織中國中世思想史研究班，對慧遠遺文有過研讀，研讀過程中乃以《廬山慧遠法師文鈔》為底本，進行了校勘整理。整理的成果一九六〇年以《慧遠研究·遺文篇》形式由創文社出版<sup>10</sup>。這次整理的成果主要是利用了日本所藏資料進行校訂，特別是增補了慧遠與鳩摩羅什問答的《大乘大義章》，引人注目。

《大乘大義章》在中國久已失傳。現存《大乘大義章》最古的鈔本，是日本京都東山禪林寺（永觀堂）所藏以《鳩摩羅什法師大義》為名的三卷本，該本抄寫於日本鎌倉時代永仁元年（1293）。《大乘大義章》在日本有很清晰的流傳線索，此處不贅，因而《慧遠研究·遺文篇》的校點者們，能夠憑藉日本多個藏本進行精到的校點。民國十九年，中國佛教歷史博物館以《遠什大乘要義問答》為名將其重刊<sup>11</sup>。

一九八〇年，石峻等人編《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一卷）》，依據《弘明集》、《廣弘明集》、《出三藏記集》等，錄慧遠遺文二十篇，一九八一年由中華書局出版。這次結集基本收錄了慧遠的重要文章，惟因主題所限，致蒐羅不全<sup>12</sup>。

一九八九年，臺北華梵佛學研究所因般若史之研習，亦有蒐集慧遠大師遺文之舉，後於一九九一年以《慧遠大師文集》之名由原泉出版社出版。該文集曾參考《廬山慧遠法師文鈔》，並增加了《大乘大義章》及田博元撰《慧遠大師年譜》<sup>13</sup>。

二〇〇六年，張景崗對《廬山慧遠法師文鈔》進行了進一步的校勘，並增補了〈遠公遺文軼事補錄〉，是為清涼書屋本<sup>14</sup>。此本在寺院中流行較廣，如東林寺多次印刷的《慧遠法師文鈔》皆以此為底本。

二〇〇九年，崔玉波編《淨苑詩萃》，由三晉出版社於二〇一〇年出版。其中

<sup>9</sup> 僧懺輯：《慧遠大師集》（上海：佛學書局，1924年）。

<sup>10</sup> 木村英一編：《慧遠研究·遺文篇》（東京：創文社，1960年）。

<sup>11</sup> 丘槃校：《遠什大乘要義問答》（北京：中國佛教歷史博物館，1930年）。

<sup>12</sup> 石峻等編：《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sup>13</sup> 華梵佛學研究所編：《慧遠大師文集》（臺北：原泉出版社，1991年）。

<sup>14</sup> 張景崗輯：《廬山慧遠法師文鈔》（北京：清涼書屋，2006年）。



第一卷為《慧遠法師詩文集》，收錄〈廬山東林雜詩〉等十二篇詩、贊、銘，並進行了注釋和現代漢語翻譯<sup>15</sup>。

二〇一四年，張景崗出版了《廬山慧遠大師文集》。此書作為「淨土宗大師文集系列」的第一種，是作者在之前校勘《廬山慧遠法師文鈔》的基礎上進行的，吸收了學術界許多新成果<sup>16</sup>。如此前諸種文鈔所錄，〈遊廬山記〉僅僅從《世說新語》和《北堂書鈔》中摘得兩段話五十餘字，附在《廬山記》後，今從《四庫全書》中所得有三百九十字，應為全篇<sup>17</sup>。此外，該集又附錄了《蓮社諸賢著述》和陳舜俞《廬山記》等。

二〇一八年，聖賢法師主編《慧遠文集》，收入慧遠故鄉山西原平之《原平文史》第二十八、二十九輯；分上下兩編，上編「慧遠法師詩文集」，下編「歷代名家詠頌遠公詩文選」<sup>18</sup>。該集收錄文獻頗廣，較之張景崗《廬山慧遠大師文集》續有增補，但有些文章是否屬於慧遠，尚可斟酌。如〈寒溪舊石橋詩〉錄自道光《武昌縣志》，原書本云「相傳為晉慧遠公所作，存以紀異」，今未加考證即直接錄入正編，似嫌不妥，不妨仍入全書附錄，「存以紀異」<sup>19</sup>。

此外，木村英一主編《慧遠研究·研究篇》中有牧田諦量〈慧遠著作の流傳について〉，對慧遠著作歷代的流傳情況進行了探討<sup>20</sup>。李幸玲博士之《廬山慧遠研究》中第二章有〈慧遠著作目錄考證〉，對慧遠文集的卷數、名稱、篇目存佚、今人輯作均有詳細考證和說明，為目前所見最詳細亦可靠之論說<sup>21</sup>。

## （二）慧遠生平之探究

研究一個人，弄清楚其作品之外，就是弄清楚此人生平，即所謂知人論世。時

<sup>15</sup> 崔玉波選注：《淨苑詩萃：詠慧遠、白人巖詩詞鑒賞》（太原：三晉出版社，2010年）。

<sup>16</sup> 慧遠著，張景崗校：《廬山慧遠大師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

<sup>17</sup> 李勤合、滑紅彬：〈四庫全書殘本廬山記的文獻價值〉，《圖書館雜誌》，2014年第3期，頁109-112。

<sup>18</sup> 釋聖賢主編：《慧遠文集》（原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原平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2018年）。

<sup>19</sup> 同前註，頁53。

<sup>20</sup> 木村英一編：《慧遠研究·研究篇》，頁467-500。

<sup>21</sup> 李幸玲：〈慧遠著作目錄考證〉，《廬山慧遠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7年），頁67-102。

代既遠，有關慧遠的直接資料偏少，今將歷代生平傳記資料羅列如下：

序號	篇名	作者	出處
1	〈遠法師銘〉	東晉南朝·張野	《世說新語·文學》注引
2	〈廬山法師碑〉	東晉南朝·謝靈運	《佛祖統紀》卷二十六 <sup>22</sup>
3	〈慧遠法師誄〉	東晉南朝·謝靈運	《廣弘明集》卷二十三
4	〈慧遠法師傳〉	南朝梁·釋僧祐	《出三藏記集》卷十五
5	〈晉廬山釋慧遠〉	南朝梁·釋慧皎	《高僧傳》卷六
6	〈慧遠傳〉	佚名	《十八賢傳》（陳舜俞《廬山記》卷三、《佛祖統紀》卷二十六、《卍續藏經》有單行本，代有增衍）
7	〈慧遠法師傳〉	唐·文諗、少康	《往生西方淨土瑞應傳》
8	〈東晉廬山釋慧遠〉	宋·戒珠	《淨土往生傳》卷上
9	〈東晉廬山釋慧遠〉	宋·王古	《新修往生傳》卷上
10	〈東晉慧遠法師〉	宋·王日休	《龍舒增廣淨土文》卷五
11	〈東晉蓮社始祖遠法師傳〉	宋·宗曉	《樂邦文類》卷三
12	〈始祖廬山辯覺正覺圓悟法師〉	宋·志磐	《佛祖統紀》卷二十六
13	〈遠祖師事實〉	元·釋普度	《蓮宗寶鑒》卷四
14	〈慧遠法師傳〉	清·彭希涑	《淨土聖賢錄》卷二 <sup>23</sup>

其他散見於《世說新語》、《名僧傳抄》、《廬山記》等書中的零星材料尚有若干。長期以來，治中國佛教史之學者均對慧遠給予較多關注，其中對慧遠生平也進行了不少探索，突出表現在對慧遠年譜的撰作上。這些年譜主要包括：陳統〈慧遠大師年譜〉（1936年）是第一部慧遠年譜，勾勒了慧遠生平事蹟，可謂導夫先路。惜稿有散佚，現僅存前半部分<sup>24</sup>。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除對慧遠早年以及東止廬山等生平活動進行探討外，還特別用「慧遠年曆」的年譜形式，將慧遠一

<sup>22</sup> 疑偽。參見李勤合：〈謝靈運廬山法師碑獻疑〉，《圖書館雜誌》，2011年第6期，頁85-88。

<sup>23</sup> 明清以降的《淨土聖賢錄》有關慧遠的傳記甚多，但沒有什麼新材料，這裏僅列一種作為代表。

<sup>24</sup> 陳統：〈慧遠大師年譜〉，《史學年報》，第2卷第3期（1936年11月），頁3-17。

生之主要活動置於當章最前。

此外，木村英一主編《慧遠研究·研究篇》附有竺沙雅章撰〈廬山慧遠年譜〉，田博元《廬山慧遠學述》附有〈慧遠大師年譜〉，方立天《慧遠及其佛學》附有〈慧遠年譜〉，區結成《慧遠》附有〈慧遠年表〉，劉貴傑《廬山慧遠思想析論》附有〈慧遠簡略年表〉，龔斌《慧遠法師傳》附有〈慧遠年譜〉等等。劉運好〈慧遠大師行跡考〉「考其行跡，詳其編年」，實際亦是一種慧遠年譜。李幸玲《廬山慧遠研究》專設〈慧遠之生平事蹟〉一節，亦有此意。

慧遠生平大致是清楚的，約分為早期（出家前）、中期（出家隨道安時期）和後期（廬山時期）三個階段。但由於過去史家對某些事件的時間記錄不清，眾多記載之間也存在歧異，所以慧遠生平中也有些地方至今尚未澄清。例如慧遠集合一百二十三人建齋立誓是教團中的一件大事，但其具體時間卻存在爭議。劉遺民撰寫的〈發願文〉記載：「維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這個以太歲紀年法紀年的「攝提格」的年代究竟是哪一年，後人有不同的說法，一說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五年（390），代表者為黃儼華<sup>25</sup>，這種說法實際是傳統僧界的觀點，東林寺至今以此為準。另一說是在東晉安帝元興元年（402），此為新說，代表者為湯用彤<sup>26</sup>。張育英根據陳垣《二十史朔閏表》推出太元十五年和元興元年七月朔日皆非戊辰日，又據《晉書·安帝紀》元興元年「春正月庚午朔」記載，推得七月朔日正好是戊辰，二十八日正好是乙未日，與劉遺民所記相符。因此，慧遠等人當年集眾念佛時間，應為東晉安帝元興元年<sup>27</sup>。

再如慧遠的卒年，一般都採用慧皎《高僧傳》中記載，認為是東晉義熙十二年（416），而不取謝靈運〈慧遠法師誄〉中義熙十三年之說，亦有存疑者，但大多沒有確實理由。李幸玲採用法顯〈佛國記跋〉中記載，主張應為義熙十三年。〈佛國記跋〉載晉義熙十二年夏安居末，慧遠迎法顯道人，並留共冬齋，因講集之際，重問遊方。這說明法顯於義熙十二年夏到達廬山，慧遠留他一直住到冬齋，此年八月慧遠不可能逝世。

<sup>25</sup> 黃儼華：《中國佛教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年），頁29。

<sup>26</sup>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231。

<sup>27</sup> 張育英：〈慧遠研究三題〉，《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2期，頁55-57。



### （三）慧遠思想之討論

慧遠的佛學思想頗受爭議，這不僅因為他的思想本身很複雜，還因為許多研究者認為，同他本身的社會活動相比，以及和同時代的佛教思想家如僧肇、道生相比，慧遠的思想似乎並無多少創造力。勞思光認為，慧遠有思想，但不是一位思想家，而更像一位活動家<sup>28</sup>。許理和《佛教征服中國》亦認為，慧遠的法身思想注重追求「某種具體的東西」，不能理解佛教「高度抽象和精微的思辨哲學」<sup>29</sup>。但這並未影響學術界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慧遠思想的研究上來。

首先，是對慧遠思想複雜性的認識。一種觀點如湯用彤認為，慧遠思想在駁雜中而有所主。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以為「慧遠學問兼綜玄釋，並擅儒學」，而其「佛學宗旨亦在般若」<sup>30</sup>。般若與三玄，當時視為同氣，而慧遠本擅長老莊三玄。慧遠當時聽道安講小品《般若》，徹悟出家，後曾自講實相義，並在荊州斥破心無義。鳩摩羅什《大智論》譯出，姚興眾人禮請慧遠作序，可見慧遠精通《般若》，眾所公認。慧遠亦曾節抄其書為《大智度論抄》二十卷。其佛學代表作《法性論》曰：「至極以不變為性，得性以體極為宗。」不變至極之體，即為泥洹。

另一種觀點則主張用綜合的眼光看慧遠，如區結成認為，把慧遠作為淨土宗始祖和般若學者的看法都失之偏頗，而提出「以綜合的眼光看慧遠」。慧遠有著同士大夫類似的「懼大法之將亡」的歷史悲懷意識，這種意識使其在佛學形式上語言通俗，結構簡化，在佛學課題上選擇屬於倫理學或價值論，而較少涉及形而上學的討論。也是因為這種意識，使他帶領的廬山教團保持著自重自持的道德風格，在當時僧團中得到敬仰，為政府所尊重，也因此獲得其在歷史上之地位<sup>31</sup>。劉貴傑認為，慧遠思想有八個特色：具有強烈回應性和論辯性；具有包容之態度與調合之精神；富有中國化之風味；深得歸宗無相宗旨；體認涅槃之終極本源；倡形神不滅之論；因果報應為自然而然；以佛學為主，儒道為輔。總的來說，「慧遠勇於面對世俗流變，善於融攝各家思想」，方有其在中國佛教史上之地位<sup>32</sup>。

<sup>28</sup>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卷二）》（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212。

<sup>29</sup> 許理和著，李四龍、裴勇等譯：《佛教征服中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272、275。

<sup>30</sup>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頁242-243。

<sup>31</sup> 區結成：《慧遠》，頁4-6。

<sup>32</sup> 劉貴傑：《廬山慧遠思想析論》，頁143-149。

方立天一九六〇年代曾發表過〈慧遠佛教因果報應說批判〉、〈試論慧遠的佛教哲學思想〉兩文。一九八二年，方立天寫了短篇〈慧遠評傳〉，一九八四年，他又寫了《慧遠及其佛學》一書。方立天全面研究了慧遠的法性本體論、形盡神不滅思想、因果報應說、彌陀淨土思想、念佛三昧方法、沙門不敬王者論、儒佛合明論等思想，他認為：「慧遠的佛教思想包含了當時已傳入的佛教各種思潮，是一個具有多方面內容的廣博龐雜體系。」有著「鮮明的調和色彩」。「這表明當時我國的佛教尚處於大量吸收和初步消化階段，還來不及詳細咀嚼佛教內部各派的分歧，深入辨別中印宗教思想的差異。」<sup>33</sup>

《慧遠研究·研究篇》也是一部全面研究慧遠思想的專著，它由京都大學的數位同事合作完成，其中〈慧遠的報應說和神不滅論〉、〈大乘大義章研究序說〉、〈慧遠的淨土思想〉、〈慧遠與後世淨土宗〉、〈廬山慧遠的禪思想〉、〈慧遠的方外思想〉等文，主要探討了慧遠的佛學思想。這些研究更多立足於文獻研究，同方立天的側重思辨頗有異趣。

李幸玲立足於中日學術界之成果，對慧遠佛學思想有更進一步之探究，尤其對慧遠本人之著作提出教內、教外之區分，釐清文本層次，指出慧遠在與羅什、僧肇等教內人士討論時，多為深入佛教義理之思考；而在與桓玄、戴逵等人的書信中，則多用儒道詞彙，意在以通俗的方式接引學人，方便溝通<sup>34</sup>。這種文本分析方法是此前學者未曾留意的，它告訴我們，對於慧遠思想的認識與評價，不應該籠統地依靠其個人文本，而是應該結合文本的對象等因素來綜合考慮。有時不是文本的字面含義，而恰恰是言外之意，更能夠代表作者的真實思想。該文研究了慧遠思想中毗曇學、般若學、念佛三昧、淨土、戒律思想。在研究毗曇學時，認為慧遠重視毗曇與其師道安對「格義」佛學的反省有關，而不同於以往所認為，慧遠重視毗曇與其所接觸的有部論師有關的思路。在研究淨土思想時，指出四〇二年的結社可能是一次應對當年災害的普通慈善法會，而沒有後人解釋的那種正式宣告結社意味<sup>35</sup>。這些觀點都是以前學者所沒有提出的，發人深省。

慧遠雖然「博綜六經，尤善莊老」，但對他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研究卻極其薄

<sup>33</sup> 方立天：《慧遠及其佛學》頁 52、174。

<sup>34</sup> 李幸玲：《廬山慧遠研究》，頁 15。

<sup>35</sup> 同前註，頁 443-454。

弱。湯用彤曾指出慧遠經學，為當時一家之言，但語甚簡略<sup>36</sup>。任繼愈則指出，佛教「離開以老莊為標誌的玄學，轉而投向儒學，與儒教相結合，這一轉變，以廬山慧遠為契機」<sup>37</sup>，其深蘊亦未見後人予以闡發。

湯用彤指出慧遠不脫當時佛學家風習，融合內外，擅長三玄，惜乎論述簡略。日本《慧遠研究》中有〈慧遠と老莊思想〉（1962年）一文，將慧遠文章中的老莊語句全部摘列出來，並和原句對照；指出，慧遠使用老莊語句，意在說明佛教思想，而對老莊學說並無發揮闡釋。這是對慧遠與道家關係研究的一篇重要論文<sup>38</sup>。王仲堯〈慧遠殷仲堪廬山論易〉從「慧遠荊州引《易》破道恆心無義」、「慧遠、殷仲堪廬山論《易》」兩個片段引發開來，指出慧遠《易》、佛互證，以此接引學人<sup>39</sup>。吳勇〈晉宋之際形神之辯與先秦道家〉（2006年）則認為，慧遠在更大範圍和更高的理論水準上依賴先秦道家思想，把晉宋之際的形神觀提升到了當時的頂峰<sup>40</sup>。

此外，對慧遠研究另一位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學者常盤大定。常盤大定曾先後五次到中國大陸調查佛教史跡，以驗證其學說的正確性，頗有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遺風。一九二〇年，常盤大定第一次到中國，就來到廬山進行田野調查，並意外發現了慧遠的墓碑。常盤大定在調查報告中對當時慧遠墓塔以及東林僧塔（歷代住持塔、僧行普通塔）的保存情形進行了較詳細的記載，並發現了宋代常總碑、慧瑄碑等珍貴史料，是近代對慧遠遺跡少有但卻最有意義的一次調查<sup>41</sup>。

#### （四）近年慧遠研究的新動向

值得注意的是，近來學界對晉宋之際佛學轉向的注意形成了一個小高潮，從而引發了對慧遠的重新認識。早在上世紀八〇年代，賴永海就在《中國佛性論》中指出，「最富有由玄學而般若而涅槃佛性過渡性質的思想，當推慧遠」<sup>42</sup>。但當時對此

<sup>36</sup>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頁 243。

<sup>37</sup> 任繼愈：《魏晉南北朝佛教經學》（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頁 2。

<sup>38</sup> 福永光司：〈慧遠と老莊思想〉，木村英一編：《慧遠研究·研究篇》，頁 395-426。

<sup>39</sup> 王仲堯：〈慧遠殷仲堪廬山論易〉，釋大安主編：《超越千載的追思》（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頁 235-241。

<sup>40</sup> 吳勇：〈晉宋之際形神之辯與先秦道家〉，《宗教學研究》，2006年3期，頁 78-81。

<sup>41</sup> 常盤大定：〈廬山の慧遠を中心として〉，《支那佛教の研究》（東京：名著普及會，1974年），頁 125-153。

<sup>42</sup> 賴永海：《中國佛性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 26-38。

回應者不多，直到進入新世紀才出現變化。賴鵬舉〈中國佛教義學的形成——東晉外國羅什「般若」與本土慧遠「涅槃」之爭〉（2000年）、吳丹《《大乘大義章》研究》（2008年）、張風雷〈從慧遠鳩摩羅什之爭看晉宋之際中國佛學思潮的轉向〉（2010年）等從慧遠與鳩摩羅什在《大乘大義章》中的討論，探討了以慧遠為代表的中國佛教學者對當時流行的般若性空學說的深刻反思；認為慧遠為晉宋之際，中國佛學思潮從大乘般若學向大乘涅槃學的重大轉向起到了思想鋪墊作用<sup>43</sup>。此前的學界往往將般若學與涅槃學作為個案研究，較少注意到二者之間此消彼長的聯繫。而對慧遠的重新發現，不僅找到了般若學向涅槃學轉變的契機，而且某種程度上顛覆了我們之前對慧遠無法理解高深和具有高度思辨性般若學的印象。循此思路，劉劍鋒《竺道生與晉宋佛學思潮轉向》（2006年）、府建明《「性空」至「妙有」：魏晉般若學的流變與轉向》（2010年）、解興華《慧遠與晉宋佛學的思想轉向》、史經鵬《從法身至佛性：廬山慧遠與道生思想研究》、張源旺《從空性到佛性：晉宋佛學核心論題的轉換》（2012年）等博士論文擴大了範圍<sup>44</sup>，不僅將視野擴大到道生，而且進一步從文化、哲學、宗教、社會等多重因素進一步探討了慧遠和道生在晉宋佛學轉型中的作用，使我們對晉宋之際中國佛學的轉型，有了比以往更清晰的認識。

另一方面，由於科學主義和日本佛教文化的影響，近現代學術界對慧遠的中國淨土宗初祖地位基本予以否定。日本淨土宗主要依據曇鸞、善導等人的學說判定自己的宗祖，但對於中國淨土教，其主流觀點仍是其創宗法師源空的三流之說，即慧遠流、慧日流、善導流。上世紀三〇年代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肯定慧遠等人彌陀信仰的同時，對「蓮社故事妄偽」進行了詳細考證，並指出曇鸞「常被

<sup>43</sup> 賴鵬舉：〈中國佛教義學的形成——東晉外國羅什「般若」與本土「涅槃」之爭〉，《中華佛學學報》第13期（2000年5月），頁349-391。吳丹：《《大乘大義章》研究》（蘇州：蘇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張風雷：〈從慧遠鳩摩羅什之爭看晉宋之際中國佛學思潮的轉向〉，《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0年第3期，頁70-75。

<sup>44</sup> 劉劍鋒：《竺道生與晉宋佛學思潮轉向》（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府建明：《「性空」至「妙有」：魏晉般若學的流變與轉向》（南京：南京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解興華：《慧遠與晉宋佛學的思想轉向》（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史經鵬：《從法身至佛性：廬山慧遠與道生思想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張源旺：《從空性到佛性：晉宋佛學核心論題的轉換》（蘇州：蘇州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

推為淨土教之初祖」<sup>45</sup>。這顯然是受了日本淨土宗的影響。但四〇年代望月信亨所著《中國淨土教理史》猶且以慧遠為「中國淨土教的主流」<sup>46</sup>。至八〇年代，任繼愈等著之《中國佛教史》亦接受這種觀點，認為慧遠對社會上流行淨土信仰的影響並不很大，而生活在南北朝後期北方的曇鸞，對中國淨土宗的形成則有直接的影響<sup>47</sup>。方廣錫〈略談初期淨土大師及淨土宗的形成〉亦持此論，認為慧遠與淨土宗的形成沒有什麼關係，曇鸞才是中國淨土宗的真正創始人<sup>48</sup>。這在日本學術界得到了呼應，佐藤成順的博士論文《中國淨土教思想史の研究》即直接從曇鸞講起<sup>49</sup>。類似觀點在陳揚炯《中國淨土宗通史》中達到了頂峰，該著明確以曇鸞為淨土宗初祖，否認慧遠為中國淨土宗的創始者<sup>50</sup>。與此相呼應，學界又特別用史料證明曇鸞或者善導才是中國淨土宗的實際開創者。這種看法目前不僅在學界，而且也開始得到教界的認同，如北京廣濟寺方丈釋演覺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在西安「漢傳佛教祖庭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淺談善導大師與淨土祖庭〉一文（該文隨後在中國佛教協會會刊《法音》2016年第12期上發表），即認為中國淨土宗的實際立宗人為善導法師。有網站甚至截取文中「善導大師為中國淨土宗實際立宗人」之語作為標題轉發，一度引發熱烈討論。尤其是中國佛協官方此次會議的宣傳網頁上也寫明善導「是淨土宗的實際創始人」，表明這一觀點已經在中國佛教界占據了重要地位<sup>51</sup>。以上這些觀點的基本思路，是利用近代從日本回傳的有關曇鸞、善導等人的資料，在否定「蓮社」和「十八高賢」真實性的基礎上，進而肯定曇鸞等人在唐代淨土教發展中的影響。

但事實上，否定慧遠初祖地位，就無法解釋中國淨土宗史，特別是宋代以後的中國淨土發展歷史。因此，堅持慧遠為淨土宗初祖這一傳統觀點的學者和教界信眾仍然很多。民國時期太虛大師甚至主張，改中國淨土宗之名為「廬山宗」，以表彰

<sup>45</sup>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頁 552。

<sup>46</sup> 望月信亨著，釋印海譯：《中國淨土教理史》（臺北：慧日講堂，1974年），頁 4。

<sup>47</sup> 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三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頁 626。

<sup>48</sup> 方廣錫：〈略談初期淨土大師及淨土宗的形成〉，《青海社會科學》，1981年第4期，頁 92-96。

<sup>49</sup> 佐藤成順：《中國淨土教思想史の研究》（東京：大正大學博士論文，1994年）。

<sup>50</sup> 陳揚炯：《中國淨土宗通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 86-182。

<sup>51</sup> 傳統的中國淨土宗祖師譜系中沒有曇鸞的位置，而以善導為二祖。以善導為實際初祖，既能突顯歷史「真實」，又能緩和與慧遠為初祖的舊說之間的矛盾。這可能是當前善導實際初祖說流行的原因之一。



廬山慧遠對中國淨土宗的貢獻<sup>52</sup>。楊文會居士在與日本淨土真宗辯論淨土宗義的同時，堅持維護慧遠作為中國淨土宗的初祖<sup>53</sup>。當代學者中，如溫金玉既承認「慧遠對淨土思想的弘揚之功」，也肯定「曇鸞與道綽的立教功德」，在原來淨土十三祖的基礎上倡議淨土十五祖說，以慧遠為初祖，曇鸞和道綽分別為二祖、三祖<sup>54</sup>。陳劍鎧認為，「淨土宗的立祖目的是為了崇敬有功之大師，令後人產生景仰，激勵上進」，亦贊成慧遠初祖之說<sup>55</sup>。存德居士所著《淨土宗教理史要》雖然「有依循日人望月信亨教授所著《中國淨土教理史》之處」，但全書仍秉持淨土十三祖說，以慧遠為初祖，善導為二祖<sup>56</sup>。筆者認為，唐宋之後新產生的淨土往生傳，都很重視慧遠作為早期淨土信仰者在樹立信徒信心方面的作用，因此特別突出慧遠結白蓮社、三睹聖相的事跡，從而逐漸塑造出一個淨土高僧和蓮社初祖的模範形象<sup>57</sup>。

還應該指出的是，大陸近年對淨土宗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這得益於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日益受到政府重視，也得益於龐大的淨土信眾和幾個重要的淨土道場，比如廬山東林寺、山西玄中寺、蘇州靈巖山寺等。二〇〇三年、二〇〇四年在山西太原連續召開兩屆「淨土宗文化研討會」，二〇〇四年在廬山東林寺召開了「紀念慧遠大師誕辰一六七〇周年學術研討會」，二〇一六年在五台山召開了「紀念慧遠大師圓寂一六〇〇周年學術研討會」。之後，二〇一七年至二〇一八年山西省原平縣連續兩年舉辦了「慧遠故里文化節」，「慧遠研討會」作為文化節的一個組成部分，也連續舉辦了兩屆。可以預見，有關慧遠的研究還將持續並保持一定的熱度，將會持續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現。

本文寫作過程中承日本龍谷大學文學研究科魏藝幫助提供資料，特此致謝！

<sup>52</sup> 釋太虛：〈整理僧伽制度論〉，《太虛大師全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頁29。

<sup>53</sup> 楊文會：《楊仁山居士遺著·闡教編》（南京：金陵刻經處，1981年）。

<sup>54</sup> 溫金玉主編：《中國淨土宗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頁159-168。

<sup>55</sup> 陳劍鎧：〈近代確立蓮宗十三位祖師的過程及其釋疑〉，《無上方便與現行法樂：彌陀淨土與人間淨土的周邊關係》（新北：香海文化事業公司，2015年），頁21-33。

<sup>56</sup> 存德：《淨土宗教理史要》（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序頁5、頁12、136、455。

<sup>57</sup> 李勤合：〈唐宋時代慧遠傳記的衍生與慧遠形象的變遷〉（臺北：第六屆聖嚴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2016年）。